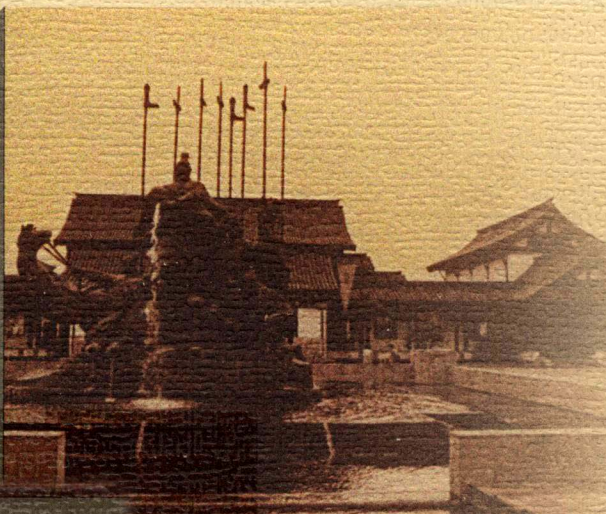


天地雄心

王开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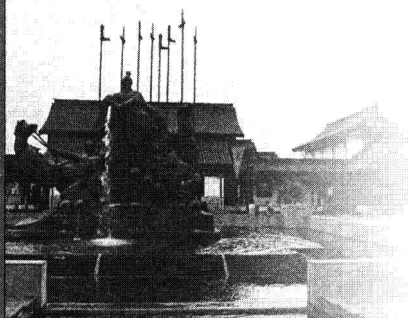


所谓的“政治”乃是一门精研治，过度地讲求技术，不重艺术，充分地追求效果，不顾后果，是其鲜明的特征。“尔虞我诈”的技术愈发发达，“巧取豪夺”的后果愈彰显，官协也就愈成为滑稽荒唐之地。

2

天地 雄心

王开林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地雄心/王开林著.—2版.—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

ISBN 7-80627-668-8

I.天... II.王...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071 号

天地雄心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256 千

印 张:11.75 插页 3

印 数:1—5 000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668--8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先后涌现了众多叱咤风云、头角峥嵘的杰出人物。其中，谁是英雄，谁是枭雄，谁又是奸雄，历史虽然早已盖棺论定，是非亦自在人心，然而，历史以经济教育人，就他们各自的命运遭际、人生行状而言，后人仍会从不同角度、层面对他们作进一步评说。人言言殊，各有所见。这正是本书撰写的宗旨。

本书由三组二十四篇文章组成。其一为《谁是英雄》、《强国梦》、《破天荒相公》等八篇，主要评说了项羽、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古人的历史功过与局限；其二为《天地雄心》、《桃源何处寻渔父》、《休言女子非英物》等九篇，重点解剖了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秋瑾等反清志士的人格魅力及悲壮情怀；其三为《吹箫说剑》、《佯狂未必不丈夫》、《飘飘何所似》等八篇，集中阐发了龚自珍、王闿运、章太炎、苏曼殊、沈从文等学界文苑翘楚的道义追求。

全书文采斐然，观点新颖，情感热烈，那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历史人物似乎都跃然于字里行间，当年金戈铁马、剑气箫声宛若眼前，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书中那独特的感受与思考，则更是令人产生共鸣，催人奋发。

自序

身为湘人，多年来，我常常会有机缘去接触湖湘雄杰们的墓地、故居、传记和民间传说，也曾将某些感性认识形诸文字。如今，我要写一本书，对他们重新作宏观与微观的考量，先前那点“存款”显然已不敷所用，还得从头攒足精神去累如山丘、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细心寻绎更紧要更隐蔽的线索。这的确是一桩难以完成的任务。我不自量力，仅凭热忱和愚勇，竟斗胆将这支“令箭”硬生生地接了下来。

“半部中国近代史乃湘人写就。”

这一由来已久的说法不无夸张，但并非完全脱离实际。晚清七十年间（1840——1911），湖南涌现出来的人才，论质论量，必得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合手方可颌颡。粗粗算来，至少有近百位顶尖英杰，在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艺术、教育等多方面，成为了近、现代中国的“火车头”。他们同赴时艰，共纾国难，从未有过畏葸和退缩。令人惊奇的是，这批湖湘英杰无论是守旧的“后卫”（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维新的“中场”（魏源、郭嵩焘、谭嗣同），还是革命的“前锋”（黄兴、蔡锷、宋教仁）都是世间不可多得的顶尖高手。若将他们

组成一支“明星足球队”，排出 433 阵型，真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在风雨如晦的百年岁月中，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文、章炳麟这些近代史上的“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一省之幸运，即为全国诸省之不幸”，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翻覆巨掌兴云播雨的能耐确实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其破坏力和创造力之大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湖湘雄杰所形成的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节骨眼上屡次起到了扶泰山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翦灭了邪教组织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的湖湘子弟保障了新疆的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革命的回声，黄兴指挥的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蔡锷打响的护国战争则铲断了封建帝制的老根。可是，星移斗转，岁月嬗替，这些湖湘雄杰的盖世功绩却变成了一笔糊涂账，越来越茫无头绪，至于他们非凡的人格则更是鲜为后世所知。对此，我能做些什么？清账与钩沉这两项工作都旷费时日，剧耗精神，非一人之力可以包办，我要做的只是像采珠者一样去打捞久已沉落于历史深处的一颗颗雄心，我相信它们依旧鲜活，并未丧失掉固有的光热。

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另一位湘籍文人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他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杨度在

《湖南少年歌》中更是用高山大海般的肺活量唱出了生命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力量发自内心深处，无往而不至。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

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先生这一毫不含糊的观点长期不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认同，但证诸古今，如合符节，很少有什么例外。伟人是一面面极其明朗的镜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那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英雄创造了时势，而一泻千里的时势则将大众悉数裹挟进来，使之患得患失，使之忧生忧死，无人可以抽身规避，包括那些创造时势的伟人本身，有时也会被自己亲手从宝瓶中释放出来的魔鬼拔刀斩于马下。历史背面的铭文犹如魔王私处的刺青，轻易是看不到的，“亡，亦百姓苦；兴，亦百姓苦”，大抵就是这十个字。英雄史诗究竟要用多少吨民众的血泪为墨方可写就？谁也不清楚，连统计学家也爱莫能助。

激扬文字的书生夸言“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然能获致非凡的快意。可是仅仅“推倒”不解决任何问题。何况在历史潮头站稳了脚跟的豪杰也不是轻易可被推倒的。我认为，关键之关键还是后人要取更贴近前人的距离理解他们的壮思、奇行和苦衷，不纠缠于非荣即辱的功罪，不轻启非善即恶的道德法庭，力求看清前人思想、情感、经历和命运的来龙去脉，因为那些个人的言与行、德与功、智与勇、悲与欢、苦与乐、幸与不幸看似孤立存在，其实早已折射到国家的现状和前途上去，留下了一道道深刻的印痕。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成为东方的醒狮与巨龙，由来久矣。然而，怎样才能真正腾飞？从何处方可获得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百余年来，湖湘雄杰一直为这个想

法所魔魔，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人无不思之良苦。自洋务运动以迄于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前车之鉴。

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谈何容易！本书共收入十六位湖湘雄杰，他们是此书的脊梁和主干，此外还有八位外地雄杰，均为一时之翘楚，莫不与湖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要特别声明，在本书中，地域概念其实相当模糊。尽管那些高蹈远翥的一代天骄与湖南这方水土血脉相连，但并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他们是属于中国大舞台的。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划分时空的畛域，意义并不大，关键在于切实把握思想的脉络——从人文角度思考中国进步之艰难。对此我试图找到一个比以往更切实的理解，未必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好在有许多良知灼灼的学者正从事着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我并不是惟一上路的人。

曾有人问我：“你用‘天地雄心’来概括这二十四个人物，是不是过于抬高了其中的某些角色？”这个问题值得一答。所谓“天地雄心”，既指那些英姿伟抱的历史人物救天下于大溺的勇者志量，也指那些惊才绝艺的历史人物济文明于大穷的智者情怀，他们的雄心恰似一颗颗钻石折射出历史的七彩虹霓，成为一道刮擦不去的风景。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那类被唾骂了百年的“刽子手”、“卖国贼”，我也要重揭谜团，让人们看看他们师徒二人在国祸孔亟之时是如何的敢负责任，不计荣辱；即便是叶德辉那样的“恶之花”，我也要将他刮垢磨光，让人们认识到这位文化流氓迥异于政治流氓的正面价值。掘开历史的坟冢，启去论定的棺钉，重作一篇“尸检报告”，这正

是我写作此书的初衷。

有一句话，我们耳熟能详，即胡适先生曾戏言的“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说捅破了窗纸，可是仅仅留意于历史的幻相和假相，难免避实就虚。历史的某些真相和本相固然长期遭到遮蔽，但它们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会有重见天光的那一天。世间总不免有一些明眼人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他们将轻装远行，挥动怀疑的镐头掘开历史的铁墓荒冢，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拼图”。此前，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即已初步显示出开掘“史墓”的意义和效果。

历史对现实的回应有时会超乎寻常地“热情”，犹如榨汁机对水果那样不依不饶。在完成此书的过程中，我已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惟雄心未死，正气不灭，历史的车辙一再失陷而犹能振拔，人们才会鼓足余勇去追踪微渺的希望之光，才不至于完全沮丧，彻底堕落。我试图擦净历史的后视镜，以求看清某些历史人物身上渐显模糊而又发人深省的强势和弱点，但尘垢积得太久太厚，仅擦亮一小块地方还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

2002年4月17日

自序 / 1

义无再辱 / 1

英雄不是杀人狂 / 11

强国梦 / 16

不信书 信运气 / 24

破天荒相公 / 49

杀人手段救人心 / 68

江海之量 / 82

独脚戏 / 94

器识与命运 / 112

天地雄心 / 126

休言女子非英物 / 150

英雄无命 / 160

特立而独行 / 183

桃源何处寻渔父 / 196

负谤千秋 / 211

凤凰涅槃 / 233

吹箫说剑 / 249

空留高咏满江山 / 256

佯狂未必不丈夫 / 276

恶之花 / 287

三副热泪 / 306

悲欣交集 / 323

飘飘何所似 / 339

云水生涯 / 345

附 录 / 361

义无再辱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

如今，多数人光凭直观印象，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文人是多愁善感的，是多疑善变的，也是胆小怕死的。“文革”之后，文人的形象就一直被钉在这个调调上；有时，甚至比这个调式还要低，低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所以广义的“知识分子”一度被贬称为狭义的“臭老九”，也无二话可说。然而，中国文人的脊梁弯曲成虾公模样，却并非古已有之，别什么烂账都往古人身上赖，而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才普遍多见的“人文景观”。在那之前，有鲁迅，有胡适，有陈独秀，有邵飘萍，有闻一多等一大批脊梁硬挺的文人，处处向与封建专制主义开火，事事与反动政府唱反调，不怕打压，不怕坐牢，不怕死亡的恫吓；在清朝的雍正、乾隆时期，文网之酷虐远远胜过电网，仍有不少文人硬着头皮，私修“明史”，刊刻怀念故国，感伤黎庶的诗文，尽管他们深知那样做的后果会是脑袋

搬家，甚至灭族，鞭尸；在明朝，东林党人和复社诸君子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与阉党（以魏忠贤、阮大铖为首）作悬崖上的殊死搏斗，头颈之硬，脊梁之挺，直把杀身视为等闲事，哪有半点精神的阳痿？在宋代，有苏东坡等一大批文人虽贬落至死，也不改初衷，那时的文人，更重要的身份是文官，是“一官二吏”的高阶层，倘若他们的言行只受利益原则的单向驱动，就很容易抹杀良知，丧失骨气。但他们坚持不同政见，在“聪明人”看来，那纯粹是吃饱了饭撑的，跟自己闹别扭，找难受，犯得着吗？在大唐，有韩愈那样批龙鳞、捋虎须的文人，爱佛骨胜过爱真理的宪宗皇帝他也敢惹，你说，他的脊梁是不是铁打的？是不是淬火加钢过？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曹魏末期，嵇康竟敢特立独行，“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异于往狼群里给司马昭那张马脸猛挥一记钩拳，你说，他是不是天地间屹然不倒的英物？在西汉，司马迁仗义直言，为身陷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犯了盛怒的暴君汉武帝，为此，他献出了中国文人最具雄风的两颗睾丸，良种没了，后世的文人便一茬不如一茬。太史公个人肉体惨遭去势，够可悲够可痛的了；两千年后，中国文人的整体精神惨遭去势，则更可悲更可痛。这出自“圣裁”的前后两刀，你倒是说说看，哪一门子独家刀法更邪恶更残忍？

喜欢披览历史载籍的读者，不难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历朝历代，强颈都斗不过快刀，骨头都挡不住斧头，批判的武器都敌不过武器的批判，从来如此，未曾有过什么例外，这就足以见出封建专制这台“绞肉机”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具有何等强大的杀伤力。但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少硬气的“傻子”，因为这样的“傻子”才代表着民族的良知，这样的“硬气”才是民族的元气。在相对蒙昧的群落中，IQ 值最高的人，

不被当成疯子，即被当成异端，作为不合群的另类，他们的命运如出一辙，不死于有形的刀斧，也会死于无形的棍棒。

不怕死的文人，他们的内心必然另有所惧，惧的是比死亡更可怕得多的东西。那会是什么？问得好，我跟你一样，对此抱有十足的好奇心。

屈原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沉的文人？是不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自沉的文人？我不是史学家，不曾在时间的大座标上作过纵向与横向的仔细考证，因而不敢轻下断言，也丝毫不觉得，让他去争取这个“中国第一”与“世界第一”的名号有任何光彩生门户之处。我所关心的只是他的那种死法——纵身跃入江流的那种死法。然而，不知从何处传来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声音：

“屈原哪是溺死的，他是蠢死的！”

他摇唇鼓舌，以百般侮蔑的口气发表新见，我当即愣怔了一下，却并没有立刻打断他的话头，而是强捺着火爆的性子听他往下说。

“你想想看吧，屈原要实现政治理想，楚怀王不肯给他一亩三分试验田，他尽可以去别处试试运气。连贾谊都在《吊屈原赋》中作了善意的质疑：‘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战国时期，遍地纷争，人才市场全面开放，诸侯求贤若渴，比眼下的招商引资还要热闹得多。他跑到别国去做个客卿，十拿九稳，做丞相，也不是不可能，而且他根本不必担心会背上‘汉奸’、‘卖国贼’之类的大黑锅，于广义的‘操守’也毫无妨害，要不然，怎么会有‘楚材晋用’的成语呢？屈原是纯度为百分之百的诗人，他若是厌倦了‘政治’这婊子样的脏东西，就该趁早收起一副哭腔，别再埋三怨四，干脆息影蒿莱，做个自由自在的化外之民，何妨行吟泽畔，泛舟江湖？何妨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何妨‘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总之，不吃楚怀王家的鹿脯饭，不想楚怀王家的烂糟事，岂不落个周身轻爽？他明知‘哲王不寤’，却偏要站入‘怨妇’的队列，对楚怀王那样愚不可及的‘负情汉’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直弄得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屈原莫非真有同性恋倾向？他是为争一日之宠，才特别厌憎（其实是嫉妒）楚怀王身边的宠姬郑袖和宠臣靳尚那帮衰人？真要是那样，屈原老夫子多掉价啊！”

听了他这番话，我的兴趣又重新抬头，往更深入打量几眼屈原。他高洁的人格不仅远远超出那个时代，而且远远超出任何一个时代。“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说的“举世”显然不只限于楚国，他说的“众人”显然也不只限于楚人。“举世”即全天下，“众人”即天下人。明代大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正始》一则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屈原所处的战国，“仁义”简直无异于笑柄，惟有合理巧用狡诈、悍勇和残虐这些黑道功夫，才能与张仪、苏秦之流一样出将入相。面对天下已亡，大浸稽首的世道人心，洁身净志的士子一旦走到极端，便会以身殉道。屈原百分之百地不合时宜，他在政治上不合时宜，在道德上也不合时宜。应该进一步说，任何一位不满于黑暗现实，不愿与强梁之辈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都百分之百地不合时宜，他们若敢于将内心的愤懑呐喊出来，将它化为精神的火喷与海啸，则尤其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不是被杀，便是自杀。屈原自沉了，他肯将自己托付给清流，是因为他相信“上善若水”，他从渔父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感悟到了生命的原旨和要义，至上的人生境界便是以清水去浣濯自己的精神之“缨”。屈原不是蠢死的，蠢死的倒真是大有人在，他的死恰恰是智慧和良知的终极体现。质本洁来还洁去，这样的觉悟，“聪明人”十辈子也无法修证得。举世滔滔，自污者像猪猡在烂泥中打滚而满心欢喜，自得其乐，他们还不明白生的意义，又如何明白死的意义呢？

屈原之后，同其感伤的贾谊也“自杀”了，他不是自沉于某江某河，也不是自沉于醇酒美色，而是自沉于内心的苦水。尽管他深知沉忧伤身，也曾在《鵩鸟赋》中以道家思想多方排解，“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但他还是不能将社稷苍生抛之脑后。在不少人看来，贾谊是幸运的，才二十郎当年纪，就做了五经博士，稍后不久，即升为太中大夫，成了汉文帝刘恒跟前的大红人。虽说刘恒宣室求贤，不问苍生问鬼神，但总体而言，仍不失为一位通情达理、体恤臣下的“明君”。只要贾谊肯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老臣周勃、灌婴等人身上多做一点感情投资，就迟早可获大用。然而真性情、直肠子、书生意气的贾谊却偏要揭破天下升平的假象，不合时宜地大放悲音：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徧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他在《治安策》里作这些忠告，就算好脾气好心肠的汉文帝（他曾下令废除肉刑）听了不觉逆耳，那些个尸位素餐、“非愚即谀”的老臣也会恨得牙齿痒痒的。作为朝廷中惟一具有危机意识的明白人，贾谊的命运遂不容乐观，注定了要在“盛世”里成为逐臣。“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就这么回事。像屈原那样心雄万夫的爱国者只留下一些伟大的诗篇，像贾谊这样洞若观火的政治天才，只留下几篇不朽的雄文，他被贬落为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教导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如何谨守封疆，岂非不可估量的资源浪费？积毁销骨，沉忧伤心，贾谊死于三十二岁的壮年，电光一闪的大汉天空又再度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

有高于一世之才，却无高于一世之命，这不仅是屈原的悲哀，贾谊的悲哀，也是所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惟有甘死如饴，经由“死亡”那面镜子，欣赏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精神所许诺的永恒，才能得到来自天堂的慰抚。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朗然相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为浩然，沛乎塞苍冥。”优秀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自杀，还是被杀，作为谁也无法剥夺的遗产，那股丰沛的浩然之气都会成为后世精神的“氧泵”和“氧仓”。

文天祥的被杀实际上也是自杀，他完全可以不死，他甚至还可以“活”得比以往更“风光”更“体面”。但他只求速死，不肯自玷自污，甚至发出了“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的喟叹，那宏音巨响，让无知的草木听了也会为之凛然一惊。在“君降臣不降”的文天祥身上，我再次看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精神极端孤洁的那一面。死神将文天祥的物质生命推入了深不可测的黑暗和虚无，但死神并非万能，文天祥的精神生